

本土化：针对全球专权主义的策略性解决方案

English title: *Localization: A Strategic Alternative to Globalized Authoritarianism*
(blog, May 12, 2018)

作者/ written by: **Helena Norberg-Hodge – Founder & Director, Local Futures**

翻译/ translated by: **Daoyi Chen/陈道一**

对于全球各国政治立场不断地转向右翼这一现象，让那些关心世界和平、平等和地球未来的人们忧虑万分。我们扪心自问：这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民粹主义成为了一股杀伤力如此巨大从而致使群众分裂的力量？而又是从何时起，专权主义再次掌控了现今的政治舞台？

从我四十多年在工业和地域文化工作中的经验来看，我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我所提到的全球化是指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其中的全球经济体系——一个被持续性放宽管制驱动着、被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塑造着的体系。然而全球化不仅存在于政治与经济之中，它也对个体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全球化背景下，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大多数人发现赚取一份赖以生存的工资越发困难，就业保障成为了过去式。与此同时，在全球各地，文化的多样性被单一文化消费替代，人们的自我认同也受到了威胁。在这种状态下，对于人们缺乏安全感这一现象也没什么可惊讶的了。从广告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所获取的经验表明，安全感的缺乏导致大众更容易被诱导。然而现在，民众不只是除臭剂和牙齿清洁用品公司的目标——当人们不再感到安全时，他们极其容易被一些因为自己本身的困境而责怪文化“他者”的宣传的怂恿所影响。

以我年轻时到访和工作了四十多年的地方拉达克，别称“小西藏”为例，这个位于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的区域地广人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这里的经济和文化一直隔绝于世。当我在七十年代初抵达拉达克时，印度政府恰好发起了西方化发展的运动。这给予了我一个既能体验古老文明传统文化又能观察现代化所带来的变化的良机。

在旧文化中，工作是为了满足社区的基本需求并提供食品、衣物和住房。虽然所挣的钱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是贫困的。遍布于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象：没有基本的住房、挨饿、营养不良或者不洁净的饮用水，这些在拉达克也没有迹象。事实上，我在拉达克经常被告知，“我们是tung-bos za-bos，”意思是“我们自给自足，有足够的水和粮食。”

在我于拉达克早期的岁月中，那里存在着一种令人惊讶的社会和谐，尤其是当多数的佛教徒和少数的穆斯林安逸地生活在一起时。当然就像所有人类群体一样，他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但是我体会到的那种享受生活乐趣、和睦的气氛与我在欧洲长大时所感受到的截然不同。

然而仅仅在十年内，佛教徒和穆斯林开始互相仇视对方，过去和谐的社会朝着一个可怕的方向发展。因为种族和宗教差异逐渐政治化，导致从未出现过的怨气和仇恨滋生于民众之中。年轻的拉达克人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方式来证明他们对宗教的信仰与虔诚。穆斯林开始要求他们的女儿们用头巾遮住头部。为了与穆斯林的祷告声一决高下，首都的佛教徒开始用扩音器播放经文。之前包括佛教徒和穆斯林在内的所有人一起庆祝宗教仪式的地方变成了炫耀财富和权力的场合。1989年，两族之间紧张的关系引发了一场夺走数条人命的暴乱。我甚至从慈眉善目的佛教徒老奶奶那里听到过她们声称：“我们要在那些穆斯林除掉我们之前杀死他们。”可她们几年前还在跟穆斯林邻居聊天喝茶，一起互相庆祝对方的宗教节日。

局外人将剑拔弩张的状态归咎于历史上种族之间紧张的关系。然而六百多年以来，这样的关系从来没有导致过群体暴力。作为一个能够流利地讲拉达克语并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来说，我有着既是外来者又是内部人士的独特视角。对我来说，突然出现的暴力冲突与政府呼吁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有着明显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最显而易见的改变集中在食物和农牧业上。由印度政府大量补贴的进口食品售价是本地产品价格的一半，从而导致了大家认为买本土的农产品看起来很不划算。食物的自给

自足被人们逐渐开始依赖的全球粮食系统所替代。多数为农夫的拉达克人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还有未来。

教育体系中的变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过去，拉达克的孩子们学习如何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生存并使家族昌盛的能力：他们学习耕种、照顾牲口、用本土资源建造房屋。然而在西化的学校里，孩子们所学的技能是为了能够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几乎所有的物品都是进口的城市里得以生存。新的学校甚至没有传授任何与拉达克的生活方式有关的内容；恰恰相反，孩子们被潜意识地教导着去轻视或摒弃传统文化。

政权和经济发展的核心也遭到变革。家庭向来是经济的中心，大多数重要的决策在乡村一级就被商讨决定。然而随着新经济体系的到来，政权和经济权力逐渐集中在了首府列城。村民们也无法再对他们生活有着严重影响的决策发表任何意见。与此同时，为了寻找带薪工作，年轻人也离开家乡去往列城。当他们突然切断了与村落的联系，开始与几百人为了稀少的就业机会激烈竞争时，这些年轻人自我认知的安全感被侵蚀了。

卫星电视的引入、广告的轰炸、一波又一波外国游客的到来再一次放大了这些变化。这所有的一切把西方和都市文化浪漫化，从而导致拉达克人在与之对比之下感到自身的落后和愚昧。

我清晰地看到全球化经济带来了的不安感和权力削弱的气氛正在蔓延开来。在实际层面，拉达克人越来越依赖外界的制造商和集中化的机构而非周围的人。在心理方面，他们对自己和拉达克的文化丧失了信心。如此一来，当人们将权利的丧失和不安的感觉转化为怒气和极端主义时也没什么可令人惊讶的了。

在拉达克，这些变革的规模之庞大与速度之快表明全球化、不安感和人们之间的冲突有着明显的关联。与此同时，全球各地也正经历着类似的改变。我意识到了，如今的经济体系是造成人们恐慌、政治动荡和原旨主义崛起的原因之一。在南北半球，全球化所引发的精神和物质的严重缺乏致使蛊惑人心的政客能够轻而易举地用恐慌和偏见控制公众舆论。

无论是身份认同政治还是传统的左派右派都不足以扭转这个趋势。相反之下，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的力量，而对国际银行和企业的放宽管制则诱发了了这些力量。为了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我们最大的希望便是扭转局面。

为了了解企业的放宽管制是如何引发民主的崩塌、原旨主义的兴盛、暴力行为的增加和极右政治家们的崛起，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到主流观点通常忽视的、一种更为宽泛的联系。

全球化与无保障

许多人尤其是左派将全球化与国际合作、旅游和人道主义价值的传播联系在一起。然而全球化的本质其实是一个经济过程——一个自二战以来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和公共议程的核心。南半球将它称为“开发”；北半球则是进步。其实在南北半球基本的过程是一样的：对商业、金融和政治的去监管化、集中化和私有化。

如今这些过程主要是通过“自由贸易”的条约来执行的。因为这些条约，企业公司能够无限制地在全球寻各地找最便宜的人力，最低的卫生和环境标准，最大的税收优惠和最丰厚的补贴。公司还可以随时转移业务这也就包括了工作机会。当法律、法规可能会威胁到公司利益时，“自由贸易”的条约甚至给予企业对政府提起诉讼的权力，这也让民主政治沦为笑柄。当地社区目睹着本地经济系统被破坏：他们被禁锢在一个时刻促进着全球经济增长的系统里，被强制性地依赖一个不稳定的、由企业主导的经济体系。

企业权力增长的趋势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自然的走向。同时，它也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所谓的“规模效益”的产物。事实上，它来源于数十年以来所产生的一系列政策抉择，包括国家、政府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所执行的政策。因为他们相信企业的增长能确保世界的和平和繁荣，所以他们有意地支持那些庞大的全球企业。

全球企业包括大银行能够利用全球各地的人力、健康、安全和环境标准之间的差异；他们甚至被给予巨大的税收优惠和大量的直接补贴。更加严重的是，企业制度是由一定范围的间接补贴所建成的，这些补贴被用在与全球化密不可分的基础设施之上。

沃尔玛、亚马逊和苹果等全球性企业需要一条完善并不断在扩建的运输系统，其中包括水路、铁路、空运、大型的高速公路甚至还有专门为了大量化石燃料的补贴而建造的运输道路。大型企业包括银行、金融中心在内需要高端的卫星通讯技术来监管产品的供应链和交付状况，来调动和转移资本。几乎所有国家的教育体系已开始训练学生在企业界中所需要的技术和能力。这些机制从结构上就偏向于庞大的全球性企业而非当地或者以场地为基础的商家，他们的造价和经费甚至都不是由大企业缴付的，而是来自纳税人。[1]

即便是那些看起来是靠着富有魅力的企业家而成为遍布全球的企业也得将他们成功的一部分归功于政府的慷慨举措。正如作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所解释的一样，就连苹果的iPhone手机也是由美国国防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共同提供经费所研究而成的，并非是乔布斯本人的想象成果。[2]埃隆·马斯克的未来企业受益于来自当地和国家政府50亿美元左右的资助，还有数十年以来的研究项目，尤其是火箭技术。[3]

令人不安的就业形势

因为企业不被任何规则所拘束，他们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比如说，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导致生产商因更廉价的人工和较低的劳工标准迁至墨西哥，而美国本土净损失的就业机会就高达七十万个左右。[5]然而，全球化是一场无止境的“竞相追逐”。这些就业机会并没有全都被留在墨西哥：仅仅于2000年10月至2003年12月间因为从中国到美国的批量进口商品更加便宜，墨西哥流失了三十万份就业机会。[5]

总体来说，墨西哥的农夫们损失最大。受到美国高额补贴的农产品渗入墨西哥的本土市场，破坏了将近2.3百万名小型农场主的生计。[6]其中许多农场主来到了的墨西哥拥挤不堪的城市，并被迫与其他人一起竞争一些收入低的工业岗位。因为就业机会的稀少，

不少人合法或者非法地移民到了美国。讽刺的是，这些全球化的受害者们成为了极右派口中美国失业率的替罪羊。

当媒体都在强调南半球产业工人的生活质量在上升时，企业通过海外业务所得到的获利远远超过了员工们享受的福利。以买一款iPhone手机的价格为例，那些真正参与其生产的中国工人只能得到少于其价格的2%，而苹果公司则赚了58%的利润。[7]

就业机会的消失不仅导致了生活水准停滞不前或不断下降同时也产生了其他的问题。因为产业随时可以转移到别处。如果工人拒绝接受低收入、长时间的工作或稀少的福利，他们就面临着失业。如此一来，众多已经生效的多边及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会削弱工人的谈判能力，抑制工资甚至包括那些还没有转移到海外的工作。

在就业岗位流失的同时商企也在集中并开展业务。当一个被税收优惠和补贴支撑起来的全球性企业进入新市场时，本地的经济通常会遭受工作岗位的净损失，依赖于人力的小型竞争者也更容易倒闭破产。数个研究表明英国每一个新超市的出现都会造成276个工作岗位的净流失。[8]

根据本土自力更生协会（Institute for Local Self-Reliance）的研究表明，依赖于网络营销的亚马逊摧毁了的工作岗位比它创造出来的要多出15万份。[9] 像其他的网络零售商一样，亚马逊也受益于用公费建造的通讯和运输系统，它还避免从美国消费者手中收取州和地方政府急需的消费税，从而获得超过实体经济“主街”将近9.75%的价格优势。[10]

与此同时，高科技导致许多工作岗位的流失。最明显的例子是制造业中机器人取代了大量的技术工人，然而农业也无法避免这样的命运。在全球化经济的影响下，出口市场对标准化商品有着大量的需求，大规模的种植这样的农作物意味着单一生产，而单一生产又意味着对工业器械和化学投入的高度依赖，而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则大幅度减少。

在农业领域中当地人的生计因此急剧下降。欧盟4百万多个面积不到10公顷的农场在上个世纪中不复存在；如今欧盟总农田的50%以上被仅仅3%的农场控制。[11]就人口统

计而言，因为农夫的人数已寥寥无几甚至比囚犯的数量还少，美国人口普查局甚至已经不再进行对农夫人数的调查。[12] 更为复杂精密的信息技术致使诸多行业的工作从人工转向电脑。虽然到目前为止收入微薄的体力工作和高技能的岗位尚未受到大幅度的影响，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对自身的工作越来越没有安全感。[13]

政治动荡

对包括银行在内的企业放宽管制促使少数的商业巨头垄断全球市场。有些商业巨头的财富和政治影响甚至比民族国家更加强大。这些跨国企业用他们前所未有的权力游说政府放宽对经济的管制，通过自由贸易协议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条约控诉政府，攻击关系到公众利益的法规。[14]

每当所谓的“自由贸易”给予大人物为所欲为的权力时，对于以国家为基础的小人物来说却恰恰相反——他们所面对的却是更多法律和限制。被大企业成功说服的政府将小型企业牢牢地锁定在不可理喻的标准和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中，限制了他们的商业活动。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法律压在小型企业身上不合理的负担其实是为了解决大规模生产而造成的难题。

举一个例子：密集笼箱养鸡的农场无疑需要大量的环境和卫生条例。数百万只基因相同、生活空间窄小封闭的动物极易感染上疾病；数吨密集的排泄物必须被安全地处理掉；长途运输的禽肉也有变质的风险。然而小型生产商，比如说拥有几十只散养鸡的农场主，面临着几乎同样的规定，他们的成本则被提升到了无法继续营业的高度。大型生产商却能将合规成本大面积的分摊开来，这让他们看起来比小型生产商们更享受“规模经济。”

与此同时，政府也因企业放宽管制陷入了贫困。为了吸引大企业而提供的巨额补贴使得他们的经费捉襟见肘。税收减免、离岸外包和跨国公司能够在多数低税收国家隐藏收益的能力削弱了政府的收益。对金融的放宽管制导致他们在全球银行和企业更加负债累累

。另一方面，政府则得解决所有的外在因素，那就是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副作用——无法避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群众与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机构渐行渐远，他们对自己的经济生活感到越发不安，人们变得焦躁、愤怒甚至对现行政治制度大失所望。虽然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必须对由企业及银行组成的实质政体作出大量妥协，大多数人还是会指责国内的政治领导人。因为许多人无法看到大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来自非主流、专权主义的候选人的谎言和空洞的承诺，从而导致这样的候选人能够在政治领域获得立足之地。

精神匮乏

随着当地甚至于国家的经济系统遭到破坏，团体与团体之间相互依存的纽带开始磨损。这不仅造成社会分裂和社会孤立也瓦解了在困难时期可以依赖于他人的安全网。

与此同时，支撑着企业增长的全球消费文化正在无情地扩展。广告商告诉世界各地的人们，“你还不够完美，你需要买我们的产品来完善自己。”

当面对面交流逐渐消失，接着，在大众媒体和不真实的社交媒体中，冰冷、人造的完美形象代替了现实生活中的榜样，畸形的攀比之风盛行于世。伴随着这些到来是包括厌食、焦虑、攻击性甚至是自杀率的上升的趋势。同时，社会孤立、家庭压力和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引发了忧郁症和行为或药物成瘾的泛滥。[15]

当人们不再感到安全并被新的经济边缘化时，他们变得更容易有偏见。尤其是在南半球，社区和文化的崩塌斩断了丰富的代际关系之间的交流，铲除了对自我的认同感而替换成了一个反映出对归属感迫切渴望的不健康替代品。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似乎为日益恶化的社会和个人问题提供了一个理由和一个极端的解决方案。它们满足了所有那些被全球化破坏掉的、基本的人类需求——人们被认可，被给予生活的意义、团体的支持和社区的归属感。

南半球国家内最引人注目、显而易见的形势——陆源群体的失根推动着那里大多数的族裔冲突、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在北半球，乡村地区也同样被全球经济力量掏空。与全球食物生产绑定在一起的小型家庭农场被夹在农企出售的投入及设备的价格上涨和买方为他们的产品支付的价格下跌之间。

他们完全无法与获得大量补贴、出口导向型的农企竞争，而他们持续的消亡则摧毁了一度支撑的当地经济和社区。在乡村长大的年轻人通常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不仅工作机会稀少，如同当初在拉达克一样，媒体和广告商告诉他们城市生活更“酷”、更加吸引人、更令人兴奋。这些地区，通常被称为美国的“心脏腹地”，为极右专权运动提供了生长的温床。

挑战专权主义：本土化的前景

我们迫切地需要提高传播度，从而认识到经济放宽管制对我们社区和个人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对情况的不了解，才导致人们对特朗普、英国脱欧、杜特尔特和其他人或问题的支持不断壮大，即使全球经济系统还在不受约束的前行。虽然这些右派的政治力量通常被冠以“反全球主义者”的称号，但他们的存在事实上巩固并增强了全球垄断。
[16]

任何意图探讨解决这个个人权利被剥夺的困境时，不仅要揭露和诊断出经济放宽管制系统方面的病症还需提供一份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最具有战略性的解决方案便是经济本土化。在本土化的道路上，经济政策会经过180度的反转：商业和金融将以当地为基础，为民主制度负责。同时这也意味着全球性企业及银行的重新规范，税收和补贴不再优先大型企业而是大规模资助小型个人生产商。重振民主制度最关键的一步是在国家、区域和地方一级重建一个更加强壮、多元化和自力更生的经济。这是一个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真正的经济体系；一个满足基本人类需求、减少不平等、力求社会和平的经济体系。

带来变革的方式不是在同一个早已弱化的政治体系里为一个候选人简单地投票。与之相反，为了创建一个能够在系统方面实施本土化的政治力量，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将人们联合起来、多元化的人民运动。这意味着让群众清楚地意识到全球化对民主的嘲弄，商业必须以当地为基础才会担起责任、遵循民主进程。我们需要开始与他人谈论政治，与那些关心社会公正与和平、失业率、环境问题和精神上或伦理价值的人们详谈。如此一来，我们将提高能够积聚单一问题、架起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桥梁的公共利益。发起面对面本土社团，再将它们与国内、甚至是国际的组织串联从而构成一个多元化的运动。大批这样的群众将会进入政治界，面对对系统性既得利益不可避免的挑战，时刻坚挺着他们亲民主、反企业的立场。

虽然像这样的一个全球化运动尚未兴起，我们已经在许些国家看到了渴望从根本上变革的星星之火。上一个英国大选里，工党的竞选宣言包含了数个进步措施，比如说重新国有化被私人企业接管的行业领域。尽管工党并没有赢得选举，它还是获得了一大部分的选票。另一个政客响应众人指责企业控制经济的实例是美国2016总统大选中的伯尼·桑德斯。

话虽至此，这其实是个复杂的问题。民族政府是最适合规范限制和全球企业的政体，然而他们同时也需要分散经济体系以满足基本需求。本土化经济体系必须处于被国家和国际条款支持的环境和社会保护伞之下，但其本身需由当地政治活动决定。这其实有些像原来只在拉丁美洲后来发展为世界级的“农民之路”——代表了世界上超过4亿多的小型农户，为他们争取粮食主权，与企业放宽管制对立。

本土化是有乘数效应的解决方案。它能减少大型企业对政治的影响，追究管理人对群众而不是企业的责任，从而重振民主。它能培育更多小型企业，使得财富在本土经济中流通，从而逆转财富的集中。它还能满足人们真正的需求而并非那些由消费文化制造出来的，它拉近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大限度地降低污染和垃圾。

通过本土化，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他们行为的影响。比如说，小规模的经济体系里，一个人能够立即知道食物是否依赖于有毒的化学物品，农场工人是否被亏待，土地是否保持健康。这样一来，商企也变得更加可靠了。[17]

当本土化优先当地居民所需要的多元化商品而不是专门为出口而制造的产品时，本土化从全球垄断商手中将经济和政治权力重新分配到数百万个小型生产商、农场主和商户那里。如此一来，它将政治权力分散，扎根于社区里，从而给予人们能够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政策的的话语权。

从以食物为主的社区农园、农贸市场、由社区支持的农业计划和都市农业，再到本土企业协会、关乎再生能源分散的计划、出借工具的图书馆和社区里的教育项目，本土化运动的急速增长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人从很大程度上意识到本土化就是应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以下是一些正在进行的计划范例：

- 在澳大利亚菲茨罗伊的人们每个月聚集于当地的公园，交换农产品包括种子、蛋、果酱、酸辣酱、鲜花、菜谱和园艺技巧。不涉及到金钱，这里提倡人们拿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这自称的城市收成不仅帮助人们省下粮食的费用，还给予居民认识邻居的机会从而建立社区联系。[18]
- 美国佛蒙特州的松岛社区农场为大多数来自非洲和亚洲的避难者提供能够延续那些他们背井离乡时所抛下的农耕和饮食习俗的机会。在那里，移民们不仅能够种植养殖实惠的、于自身文化息息相关的食物，也可以与他人和当地社区沟通交流。[19]
- 英国牛津郡的低碳活动中心正在建造一个当地自主的、分散再生资源的基础设施——将棕色地带和屋顶转变为微型电网为了符合当地需求。[20]
- 即使是大量灾祸和悲哀的根源——财政系统也通过本土化引发了深刻的影响。比如说，在巴西福塔雷萨的贫民窟里，居民们建造并运营了一座名叫拉斯帕尔马斯（

Las Palmas) 的社区银行，其主旨便是满足当地需求。当这个项目刚开始运行时，只有20%的采购是在当地进行的；然而今天，其数量超过了90%。[21]

在千万个有创意的草根倡议之中，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他们既证明了本土化的可行性也显示了系统性的效益。

不幸的是，本土化有时与孤立主义和右翼民族主义混为一谈。事实恰恰相反：为了遏制商业巨头，本土化需要国际上的合作和支援；因为被建立于对文化多样性的万分敬意之上，它宽容各个方面的差异。

英国普雷斯顿市是展示本土化如何扩展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2011年为了应对国家政府资助减少的问题，当地市县议会开启了本土化采购项目。通过改变六个地区机构包括警局、业主协会和大学支出的侧重方向，两年之内在当地供应商购买的比例从14%上升到了28%，且当地合作企业的数量也一并增长了。[22] 与孤立主义相差甚远，作为欧洲采购网络的一份子，普雷斯顿市议会和欧盟其他地方的城市展开合作，探究如何在对方本土的经济市场实施相似的举措。

在国家及国际方面，其他的关系网也在日益壮大。其中包括联合了几百名北美各地的当地商业领袖并分享最佳范例的本土生活经济商业联盟（BALLE）。新经济联合会（New Economy Coalition）同样将全美的非政府组织、商企和社会运动参与者聚集在一起，交流本土化的实施对策。变迁中的城镇（Transition Town）竭尽全力将化石燃料经济中脱钩的组织联系在一起。我的组织本地化之未来设立了一个国际联盟，交流本土化（IAL）的最佳做法。我们将这种交流上升到了全球性的级别并包括了来自50多个国家以上的组织和个人成员。真正的本土化意味着大规模的形势是由数个小规模聚集而成的，并且需要来自各个方面的合作。

在进步人士中，接受本土化的计划有一个重大的挑战——本土和自然才是“精英主义”，而且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这样的生活品质。虽然公司智囊团有策略地传播着这些信息，其实无论是有机食品、本土自然的建材和织物还是替代疗法，自然健康的替代商品

较高售价的原因主要是由成本外化、受到政府补贴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所造成的结果。抛开那些人人为的包装，全球化商品的价位对大多数人来说都遥不可及。

另一个与“精英主义”相关的控告是致力于本土化当地经济的北方人，即认为他们对需要北方市场来脱贫的南半球的贫困人群视而不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数年以来，根基于殖民主义和奴役的出口导向型“发展”导致大多数南半球国家负债累累，这些负债大多累积成全球贸易的基建。然而今天，建造于南半球工人劳动力之上的巨大财富被用来偿债，而并非满足当地需求。推广本土化意味着鼓励南北半球的人们自力更生并将他们的经济活动多样化。本土化意味着北半球的人会放过世界另一端的人们，尤其是当贫困的直接源头是因为被迫制造出口商品而不是满足自身需求时。扭转双方的依赖性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它是一个涉及到南北草根组织紧密合作的谨慎而小心的经济过程。

鉴于我们各方面包括环境、社会和经济在内的全球危机，政府应该从根基上改变方向——不再继续放宽管制、补贴大型全球性企业及银行，而是集中于资助本土交易和小型生产商。因为粮食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需要的日常用品，一个重要的焦点便是重建本土食品经济，从而增强整个经济体系、重塑社区、帮助并恢复环境，甚至有助于抵御全球变暖的恢复能力。在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网中，我们不再依靠外界满足基本需求，一个多元化、本土化的生产系统能够更好地帮助社区抵抗即将到来的动乱。

全球企业的公关部不言而喻地在努力抵制这则讯息，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想要喂饱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无论全球粮食系统是什么价格，我们除了对消耗化学品和能源的单一产业、基因工程和全球贸易加倍下注之外别无选择。[23]然而在世界各地开展的研究表明以每单位土地、水和能源利用计算，小型农场比起大规模单一栽培能够更加高效地生产。全球企业则完全无视了这一点。[24]只有关乎单位劳动生产的速率时，工业化农业才会变得高效。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牺牲百万农作岗位，那么单一栽培就非常符合条件。但是如果是想运用地球现有的可耕地、新鲜水源和能源来持久地尽可能生产粮食的话，则不然。

当农业的工业化已经进行了许多代时，生活在北半球的人们很容易忽视一点——世界上大部分的消费粮食耕种在小于5英亩的小型农场之上。[25] 如果工业化单一栽培替换下这些小农场，这意味着数百万人的生计将被摧毁，迫使他们在城市贫民窟里陷入真正的贫困之中。当这百万人中一定数量的人们变得焦躁、愤怒并容易接受极端思想时，我们并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

全球粮食体系也在其他方面低效率并有所不足，尤其是涉及到“冗余贸易”时。在普通的一年里，英国出口牛奶、面包和猪肉，每种都超过10,000吨，同时他们还在进口将近同样数量的货物。美国也是如此，出口并进口将近1百万吨的牛肉，千万吨的土豆、糖和咖啡。[26] 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一款商品被同时出口并进口着。比如苏格兰的虾被定期运往中国，经过手工剥壳后再被运回苏格兰裹粉、包装最后售卖。[27] 这可能触及到农业综合企业的底线，但这很难被称为高效率工业。

目前看起来，基于贸易的粮食系统无法持久地养活当今的全球人口。在企业比过去更加牢靠地掌控着粮食的状况之下，即使地球上生产着足够喂养所有人的粮食，还是有8.7亿左右的人口营养不良。[28] 以美国为例，长期的供应链和企业销毁有瑕疵的生产出来的商品，这意味着超过40%的人类可食用的食物被丢弃。[29] 全球被扔掉食物的总量是可供喂养世界上所有营养不良的人们所需食物数量的4倍。[30]

为了支持食物本土化的运动，补贴可被用于加强包括本土消费者与生产商之间销售线路在内的当地基础设施，甚至直接补给小规模、多样化的农场。通过政策改革，我们将目睹一个本土、就业机会丰富、以社区为基础、生态经济系统迅速地成为主流，即使是薪水低的打工者也能收益于当地经济。同样的，减少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对更污染环境的行业加税可以将资源密集型经济的隐藏费用内部化，致使市场价格更贴近资源和污染成本。这些改变会导致面对广泛人群的本土产品会变成更便宜、更方便的选择。

专权主义的崛起仅仅是经济全球化互相关联的影响之一。如今的全球经济加剧了经济不安全感、破碎了社区团体、动摇个人对自身文化的认知，从而创造了专权统治者崛起

的最佳条件。如果全球化的环境代价包括全球变暖、荒漠化和洪水不断上升，我们能预测更大规模的难民潮的到来，这将导致民族国家陷入动荡，使得他们采取人道行动的积极性和能力则捉襟见肘。

应对所有危机最有策略性的办法是立即开始缩减分散经济活动，并给予社区和当地经济尽可能地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尤其是人们对人际关系的渴求。

经济本土化的运动需要多方面的策略性变革：普遍认知的提高、积极的政治竞选、草根组织明智的行动和国际方面的协作。虽然这些似乎并不足以应对世界危机的规模，但是本土化举起的大旗有潜力让所有政坛范畴的人们参与其中，还能够将上百个单一议题集中在一起。它使我们“相互指责的闹剧”和由混乱与恐慌引发的敌对性分裂留在过去，反之，我们将在以了解目前危机大局为支柱下团结起来。如此一来，具有系统性与协作性的本土化最终是破解专权主义问题的最有效的良药。

[1] Gorelick, Steven, *Small is Beautiful, Big is Subsidized*, ISEC, 1996, Chapter 3, “Infrastructure and Scale”.

[2] Mazzucato, Mariana,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London and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13

[3] Aronhoof, Kate, “The Case for Nationalizing Elon Musk”, *In These Times*, Feb 2, 2018.

[4] Faux, J. (2013) ‘NAFTA’s impact on US worker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9 December 2013 (<http://www.epi.org/blog/naftas-impact-workers/>)

[5] Fabens, Isabella, “China’s Latest Investments in Mexico: The Plight of Maquiladora Workers”, Council on Hemispheric Affairs, Aug 14, 2013, <http://www.coha.org/chinas-latest-investments-in-mexico-the-plight-of-maquiladora-workers/>

[6] Faux, J. op cit

[7] Hart-Landsberg, M. (2017) ‘US Corporations Continue Their Global Dominance’, Reports from the Economic Front, 21 April. <https://economicfront.wordpress.com/2017/04/21/us-corporations-continue-their-global-dominance/>.

[8] Friends of the Earth UK, ‘How to... Oppose a Supermarket Planning Application’, Friends of the Earth UK, September, 2005.

https://www.foe.co.uk/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campaigning_against_supermarkets.pdf

[9] Laveccia, Olivia and Stacy Mitchell, “Amazon’s Stranglehold: How the Company’s Tightening Grip Is Stifling Competition, Eroding Jobs, and Threatening Communities”, Institute for Local Self-Reliance, Nov 2016. (https://ilsr.org/wp-content/uploads/2016/11/ILSR_AmazonReport_final.pdf)

[10] Sales Tax Institute, “State Sales Tax Rates”, July 1, 2017.

(<http://www.salestaxinstitute.com/resources/rates>)

[11] TNI, “Land for the few: the state of land concentration in Europe”,

<https://www.tni.org/en/publication/land-for-the-few-infographics>

[12] Vidal, John, “eco soundings”, *The Guardian* (London and Manchester), September 6, 2000, “Society” section, p. 8

[13]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515926/how-technology-is-destroying-jobs/>

[14] Friends of the Earth Europe, ‘The TTIP of the anti-democracy iceberg’, Friends of the Earth Europe Report, October, 2013

(http://www.foeeurop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foee_factsheet_isds_oct13.pdf);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Council of Canadians/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2013) The right to say no. EU-Canada trade agreement threatens fracking bans,
(<http://corporateeurope.org/publications/right-say-no-eu-canada-trade-agreement-threatens-fracking-bans>).

[15] Monbiot, G. (2014) ‘The Age of Loneliness is Killing Us’, *The Guardian*, 15 October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oct/14/age-of-loneliness-killing-us>);
Alexander, B. (2010) *The Globalization of Addiction: A Study in Poverty of the Spirit*,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press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Politics of Mental Health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s://www.springer.com/us/book/9780387727127>).

[16] Hart-Landsberg, M. (2016) ‘Confronting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Reports from the Economic Front , 16 December (<https://economicfront.wordpress.com/2016/12/16/confronting-capitalist-globalization/>);

[17] Dorninger, C., Abson, D.J., Fischer, J., and von Wehrden, H. (2017) ‘Assessing sustainable biophysical human–nature connectedness at regional scale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12, 24 April.

[18] Local Futures, Planet Local: “Food Swapping and the Fitzroy Urban Harvest,” (<https://www.localfutures.org/programs/global-to-local/planet-local/food-farming-fisheries/australia-food-swapping-fitzroy-urban-harvest/>)

[19] Local Futures, Planet Local: “Refugees Put Down Roots through Community Farming,” (<https://medium.com/planet-local/refugees-put-down-roots-through-community-farming-8396934e2fe9>)

[20] Local Futures, Planet Local: “Low Carbon Hub,” (<https://www.localfutures.org/programs/global-to-local/planet-local/local-energy/uk-low-carbon-hub/>)

[21] Local Futures, Planet Local: “Banco Palmas,”
(<https://www.localfutures.org/programs/global-to-local/planet-local/local-business-finance/brazil-banco-palmas/>)

[22] <https://thenextsystem.org/the-preston-model>

[23] see for example: Oosthuizen, E., “Collaboration is Helping to Feed the World”, Monsanto, May 10, 2017. <https://monsanto.com/company/commitments/food-security/articles/collaboration-helping-feed-world/>

[24] GRAIN (2014) “Hungry for land: small farmers feed the world with less than a quarter of all land,” <http://www.grain.org/article/entries/4929-hungry-for-land-small-farmers-feed-the-world-with-less-than-a-quarter-of-all-farmland>.

[25] Estimated from FAO, “Family Farming Knowledge Platform,” accessed December 16, 2015, <http://www.fao.org/family-farming/background/en/>.

[26] FAOSTAT,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http://www.fao.org/faostat/en/>?. Also see: Ten Veen, R. (2011) ‘Global Food Swap’, Greening the North, Wuppertal Institute; Lucas, C. (2001) ‘Stopping the Great Food Swap: Re-localising Europe’s Food Supply’, The Greens/European Free Alliance/ European Parliament; Norberg- Hodge, H., Merrifield, T., and Gorelick, S., (2002) *Bringing the Food Economy Home*, London, Zed Books, p. 18.

[27] Ungeed-Thomas, J. and Meyer, M.R. (2007) ‘British Prawns Go To China To Be Shelled’, *The Sunday Times*, May 20,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british-prawns-go-to-china-to-be-shelled-8b7zrs7nzpg>. Also see: Scotsman Editors (2006) ‘Jobs lost as Scottish scampi sent on round trip to China’, *The Scotsman*, September 25, <http://www.scotsman.com/news/scotland/top-stories/jobs-lost-as-scish-scampi-sent-on-round-trip-to-china-1-1141935>

[28] FAO (2012) ‘Globally Almost 870 Million Chronically Undernourished – New Hunger Report’,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October 9,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61819/icode/>

[29] Dana Gunders, Wasted: How America Is Losing Up to 40% of Its Food from Farm to Fork to Landfill (Washington, DC: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2012),
<https://www.nrdc.org/sites/default/files/wasted-food-IP.pdf>.

[30] “Global food waste: the numbers behind the problem”,
<https://insinkerator.co.uk/uk/page/global-food-waste-stats>

Read blog in English here: <https://www.localfutures.org/localization-a-strategic-alternative-to-globalized-authoritarianism/>

Read all our blogs here: <https://www.localfutures.org/blog/>